

略論古白話詞匯研究的新發展

徐時儀*

語言學是現代科學的領先學科，現代化的語言信息大大地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而語言學的基礎和核心，歸根結底是信息載體——詞。詞語的研究在語言學中是個重要領域。語言中的詞是語言最基本的成分，也是語言成分中最具生命力的底層單位。「沒有語法人們可以表達的事物寥寥無幾，而沒有詞匯，人們則無法表達任何事物」。¹詞匯對社會的變化極為敏感，生產的發展，新事物的出現，制度的因革，風習的改變，無一不在詞匯中迅速反映出來。中國傳統語言學發展到清代的乾嘉時代達到了古代語言文字研究的高峰，然而由於政治的原因和歷史的局限，我國傳統的語言學作為儒家經學的附庸，主要以明經為用，偏重於古代漢語的研究而忽視白話詞語的研究，重視文字而忽視了文字所代表的語言，未對漢魏以來的新詞俗語作系統研究。隨著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傳統語言學開始向現代語言學轉變，語言文字研究不再是經學的附庸，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等方面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了新的發展，古白話詞匯的研究也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許多學者投身到這一未經充分開發的處女地。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學術界以更開闊的視野看世界，古白話詞語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²國內外學術刊物上不斷有研究古白話詞語的論文發表，研究古白話詞語的一些專著也相繼出版問世，研究成果斐然可觀，大致上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為主且學力堅實的研究隊伍，研究對象既涉及古代各類文獻，同時又相對集中在不同歷史時期內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口語文獻上。就範圍而言，上至漢魏，下至明清，詩文、筆記、小說、戲曲、語錄等均在研究之列。就內容而言，除了考釋詞義外，還涉及詞義的構成、詞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1 加拿大Hector Harmerly：《詞匯教學》，載《國外外語教學》1989年第1期。

2 本文所指古白話詞語包括中古漢語和近代漢語詞語。有關中古漢語和近代漢語的分期各家說法不一，中古漢語和近代漢語二者間互有交叉，且「近代漢語」這一術語中的「近代」與人們通常慣用的中國歷史分期所指「近代」不同，易引起混淆，因而本著聯繫的、發展的觀點，我們認為用「古白話」來指中古漢語和近代漢語會更合適一些。江藍生在《古代白話說略》中曾指出：「古代白話跟漢語史的分期有直接關係。長期以來大學裡教漢語只有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之分，把『五四』時期以前的語言統統稱為古代漢語。這種分期忽略了文言與白話的區別，沒有正確地反映漢語發展的歷史階段，因而是不太科學的。」（語文出版社，2000年版，頁7）有關古白話的形成可參拙著《漢語白話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義的系統、詞義的詮釋、詞義的演變、詞義的色彩、詞義與語音、詞義與文字等，從一般的詞義考釋拓展到對某一類詞，或者一組相關詞的綜合研究和比較研究，注重於考探詞義的深層內涵和語用特徵，呈現出知其所以然的理論關注和規律探討的趨勢。就材料而言，有的論文大量使用了出土文獻和佛經中的語言材料，且不僅限於中土文獻，而且涉及域外文獻，在考釋詞義的源流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就方法而言，將詞的歷時演變和共時變異結合起來研究，注重以動態的、聯繫的觀點來對詞及其相關的語言現象進行多角度、多側面的研究，有的論文廣泛運用了方言佐證法，從現代漢語的某些方言中去追蹤古白話詞語的淵源關係，理清了一些常用詞的演變過程。就手段而言，隨著文獻信息載體向網路化、電子化的發展趨勢，利用電腦建立古白話語料庫，進行快速、準確、全面的檢索和多角度多方面的統計分析，已成為古白話詞匯研究的先進手段。本文擬就古白話詞匯的研究擇要略作論述。

一、古白話俗語詞的考釋

「五四」以前，文言文被認為是雅的，白話文被認為是俗的。傳統語言學主要以先秦兩漢的文獻資料為研究對象，重古輕今，重通語輕方言，重書面語輕口語，重僻字僻義的訓釋輕常用詞的考釋，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主要傾向。隨著「五四」以後白話由不登大雅之堂到升堂入室取代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傳統語言學的研究也衝破為經學服務的藩籬，而以漢譯佛經、敦煌遺書、禪儒語錄、筆記、詩詞曲、戲劇、小說等古白話文獻資料為研究對象，開闢了研究漢魏以來古白話俗語詞的新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其中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和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是考釋古白話俗語詞的代表著作。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成書於1945年，作者用了八年時間寫成此書，195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初版以來，屢次再版。全書6卷，匯集解釋唐宋金元明人詩詞曲中的特殊詞語六百多條，詳引例證，詮釋其意義，剖析其用法，材料豐富，考釋精當，從語言學的角度對「鎮」、「廝」、「解道」、「怎生」、「端的」等俗語詞作了較為系統的研究。這些詞語大都是歷史上當時通俗的古白話，或見於詩詞，或見於戲曲，向來沒有專書作過解釋。作者在《敘言》裡說：「詩詞曲語辭者，即約當唐宋金元明間，流行於詩詞曲之特殊語辭，自單字以至短語，其性質泰半通俗，非雅詁舊義所能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習見也。」「其字型生澀而義晦，及字型普通而義別者，則皆在探討之列。」作者作此書的意圖是循《助字辨略》和《經傳釋詞》的途徑，綜合研究詩、詞、曲中的特殊詞語，補詩、詞、曲方面注釋本子不多而又不大注重語辭的缺憾。

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專門解釋敦煌石室所出唐五代變文中的口語詞語，1959年由中華書局初版。初版以來，每次修訂，作者都本著在科學研究方面精益求精的態度加以增訂，從而形成此書博大精深的格局，學術價值甚高，國內外學者都認為是中國當代敦煌語言學研究的重大成果，首次對敦煌變文中的口語詞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開敦煌資料詞語研究的先河。全書共釋840個字詞，大體以翔實可靠的材料為基礎，從解疑入手，以點及面旁通其他文獻，然後上溯詞義之語源，下及方言俗語以證古語，運用本證、旁證、參互校核、因聲求義等方法體會聲韻、辨認通假及字形，審視文例、玩繹章法和文意，在縱橫繫聯中歸納比勘，勾勒出俗語詞之產生、發展的演變脈絡和詞形變幻及用字異同，在共時和歷時的框架中將古白話俗語詞的研究納入了漢語詞匯史的軌道，為漢語詞匯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例，揭示了詞義變化的一些規律。

黎錦熙在1933年出版的《比較文法》一書序言中曾說其時「只有周秦漢晉『經』、『傳』釋詞，沒有唐宋明清『詩詞』、『語錄』、『戲曲』、『小說』釋詞」，而隨著古白話詞匯研究的開拓和發展，近些年來唐宋明清的「詩詞」、「語錄」、「戲曲」、「小說」已大多有了釋詞。³如考釋漢譯佛經詞語的論著有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匯研究》(1992)，俞理明《佛經文獻語言》(1993)，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匯的發展》(1994)，顏洽茂《佛教語言闡釋》(1997)，胡敕瑞《〈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2002)，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2003)，李維琦《佛經詞語匯釋》(2004)，陳秀蘭《魏晉南北朝文與漢文佛典語言比較研究》(2004)，王紹峰《初唐佛典詞匯研究》(2004)，竺家寧《佛經語言初探》(2005)，徐時儀《玄應〈眾經音義〉研究》(2005)，景盛軒《〈大般涅槃經〉異文研究》(2009)等。

考釋敦煌吐魯番文獻詞語的論著有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1997)，張金泉、許建平的《敦煌音義匯考》(1996)，項楚《王梵志詩校注》(1991)，曾良《敦煌文獻字義通釋》(2001)，黃征《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2002)，陳秀蘭《敦煌變文詞彙研究》(2002)，王啟濤《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考釋》(2005)，陳明娥《敦煌變文詞匯計量研究》(2006)，張小豔《敦煌書儀語言研究》(2007)，葉貴良《敦煌道經寫本與詞匯研究》(2007)等。

3 限於篇幅，凡2000年前的論著擇要略舉，詳可參拙著《古白話詞匯研究論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考釋禪儒語錄詞語的論著有袁賓《禪宗著作詞語匯釋》(1990)，董志翹《〈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匯研究》(2000)，唐賢清《〈朱子語類〉副詞研究》(2004)，譚偉《〈祖堂集〉文獻語言研究》(2005)等。

考釋詩詞曲詞語的論著有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1953)，王鏊《詩詞曲語辭例釋》(1980)，陸澹安《戲曲詞語匯釋》(1981)，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1990)，王雲路《漢魏六朝詩歌語言論稿》(1997)、《六朝詩歌語詞研究》(1999)，項楚《寒山詩注》(2000)，魏耕原《全唐詩語詞考釋》(2001)、《唐宋詩詞語詞考釋》(2006)，閔豔《全唐詩名物詞研究》(2004)和《唐詩食品詞語與文化之研究》(2004)，徐頌列《唐詩服飾詞語研究》(2008)，郭作飛《〈張協狀元〉詞匯研究》(2008)，王學奇、王靜竹《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2002)等。

考釋小說詞語的論著有陸澹安《小說詞語匯釋》(1964)，香阪順一《〈水滸〉詞匯研究(虛詞部分)》(1987)，江藍生《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1988)，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匯釋》(1992)，張惠英《〈金瓶梅〉俚俗難詞解》(1992)，段觀宋《文言小說詞語通釋》(1993)，鮑延毅《〈金瓶梅〉語詞溯源》(1996)，遇笑容《〈儒林外史〉詞匯研究》(2001)，譚耀炬《〈三言二拍〉語言研究》(2005)，周志鋒《明清小說俗字俗語研究》(2006)，范崇高《中古小說校釋集稿》(2006)，周俊勳《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詞匯研究》(2006)等。

考釋史書詞語的論著有劉百順《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考釋》(1993)，方一新《東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1998)，張能甫《〈舊唐書〉詞匯研究》(2002)，楊小平《〈後漢書〉語言研究》(2004)，萬久富《〈宋書〉複音詞研究》(2006)，高明《中古史書詞匯論稿》(2008)，宋聞兵《〈宋書〉詞語研究》(2009)，劉傳鴻《兩唐書列傳部分詞匯比較研究》(2009)等。

考釋筆記雜著詞語的論著有王鏊《唐宋筆記語辭匯釋》(1990)，吳金華《〈世說新語〉考釋》(1994)，周日健、王小莘《〈顏氏家訓〉詞匯語法研究》(1998)，張能甫《鄭玄注釋語言詞彙研究》(2000)，化振紅《〈洛陽伽藍記〉詞匯研究》(2002)，羅維明《中古墓誌詞語研究》(2003)，劉志生《東漢碑刻複音詞研究》(2007)，汪維輝《〈齊民要術〉詞匯語法研究》(2007)，姚美玲《唐代墓誌詞匯研究》(2008)等。

考釋方言、市語詞語的論著有王鏊《宋元明市語匯釋》(1997)，張惠英《漢語方言代詞研究》(2001)，景爾強《關中方言詞語匯釋》(2002)，張華文《昆明方言詞源斷代考辨》(2002)，蔣宗福《四川方言詞語考釋》(2002)，褚半農《〈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2002)，鄧章應《〈躋春台〉方言詞語研究》(2006)等。

考釋斷代和中古、近代漢語詞語的論著有蔡鏡浩《魏晉南北朝詞語例釋》(1990)，王雲路、方一新《中古漢語語詞例釋》(1992)，李申《近代漢語釋詞叢稿》(1995)，江藍生《近代漢語探源》(2000)和《近代漢語研究新論》(2008)，顧之川《明代漢語詞匯研究》(2000)，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2002)，王鏌《近代漢語詞匯語法散論》(2004)，曾昭聰《中古近代漢語詞匯論稿》(2004)，曹小雲《中古近代漢語語法詞匯叢稿》(2005)，敏春芳《文獻字詞考略》(2005)，崔山佳《近代漢語詞匯論稿》(2005)，楊榮祥《近代漢語副詞研究》(2005)，楊愛姣《近代漢語三音詞研究》(2005)，雷漢卿《近代方俗詞叢考》(2006)，陳群《近代漢語程度副詞研究》(2006)，丁喜霞《中古常用並列雙音詞的成詞和演變研究》(2006)，何亮《中古漢語時點時段詞匯論稿》(2007)，金桂桃《宋元明清動量詞研究》(2007)，徐時儀《古白話詞匯研究論稿》(2000)、《漢語白話發展史》(2007)，雷冬平《近代漢語常用雙音虛詞演變研究及認知分析》(2008)，周俊勳《中古漢語詞匯研究綱要》(2009)等。

古白話俗語詞的考釋與詞典編纂有著密切的關係。詞典的編寫以詞匯研究為基礎，同時又反過來推動詞匯研究的深入。王力《理想的字典》(1945)提出「字的形、音、義的變遷，乃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拿歷史的眼光來看，經義和俗義的價值無輕重之分」。古白話俗語詞是語文辭書收錄詮釋的重要組成部分，《辭源》、《辭海》、《國語辭典》和《漢語大詞典》等大型語文辭書都十分注重收錄詮釋古白話俗語詞，尤其是《漢語大詞典》，古今並收，源流並重，收字22000個，詞語37萬條，其中有不少是古白話俗語詞。一些專書詞典和斷代語言詞典也十分注重收錄詮釋古白話俗語詞，專書詞典主要有張永言《〈世說新語〉辭典》(1992)，張萬起《〈世說新語〉詞典》(1993)，蔣禮鴻等《敦煌文獻語言詞典》(1994)，辛嶋靜志《〈正法華經〉詞典》(1998)、《〈妙法蓮華經〉詞典》(2000)，廖珣英《〈全宋詞〉語言詞典》(2007)等。斷代語言詞典有龍潛庵《宋元語言詞典》(1985)，劉堅和江藍生擔任總主編的近代漢語斷代語言詞典系列(1997—1998)《唐五代語言詞典》、《宋語言詞典》和《元語言詞典》，高文達主編的《近代漢語詞典》(1992)和許少峰主編的《近代漢語詞典》(1997)，石汝傑、宮田一郎主編《明清吳語詞典》(2005)等。

二、古白話常用詞的研究

任何一種語言構成一個歷史時期的詞匯系統的主要成分畢竟是那個時期中使用得較多的常用詞。詞匯體系中各個單位在共時條件下語義上處於彼此制約、聯繫的平衡狀態，新成分的出現或舊成分消失都會打破原有平衡機制，導致詞義再分配

並引起詞匯體系的發展演變。王力在《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一文中指出常用詞在漢語詞匯系統中的演變情況，一種是今詞代替了古詞，如「怕」替代了「懼」，「褲」替代了「禪」；一種是同義的兩個詞競爭，結果甲詞戰勝了乙詞，如「狗」戰勝了「犬」，「豬」戰勝了「豕」；一種是由綜合變為分析，即由單音節詞變為複音節詞，如「漁」變為「打魚」，「汲」變為「打水」，「駒」變為「小馬」，「犢」變為「小牛」。⁴常用詞的古今演變大多是文白的興替，隨著古白話中新的口語常用詞不斷地產生，文言中的一些常用詞逐漸被替代。如上古表示「睡覺」最常用的詞是「寢」，戰國產生了「臥、眠、睡」這三個新詞。其中「臥」逐漸取代「寢」成為表示「睡覺」義的主導詞。東漢三國時，「臥、眠、睡」三者混用。南北朝時，「眠」基本取代了「臥」。唐以後，「睡」又替代了「眠」。又如文言中的「囊」，白話中用「袋」表示。「袋」在南北朝的一些白話文獻中已出現，如晉葛洪《肘後備急方》有「絹袋」，北周庾信有《題結線袋子》詩，《齊民要術》有「絹袋」、「布袋」、「紙袋」、「毛袋」和「袋子」等，大約在北魏「袋」已替代「囊」表示「袋子」義，並沿用至今。⁵

古白話常用詞的研究也充分體現了古白話詞匯研究的新發展。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王力首先明確提倡並進行常用詞的研究。他在《漢語史稿》第四章「詞匯的發展」中勾勒了若干組常用詞變遷更替的輪廓，又在他主編的《古代漢語》中專門訓釋了一千一百多個常用詞，尤其注重辨析詞義演變的微細差別。此後朱自清、葉聖陶、呂叔湘在《開明文言讀本》導言中也對古今詞語作有比較，展示了常用詞詞義演變的規律性。近些年來蔣紹愚多次論及這一問題，如《近代漢語詞匯研究》中有「常用詞演變的研究」和「各階段詞匯系統的描寫」專節的論述，以「吃」、「喝」、「穿」、「戴」四個常見的詞為例作有說明。⁶又如《關於漢語詞匯系統及其發展變化的幾點想法》一文中對《祖堂集》裡「木／樹」「道／路」「言／語／說」等幾組同義詞的考察(1989)等等。還有專文《白居易詩中與「口」有關的動詞》(1993)，分析探討了與「口」有關的四組動詞從《世說新語》到白居易詩和《祖堂集》的發展演變情況，並運用了判別新詞與舊詞的兩種基本方法——統計使用頻率和考察詞的組合關係。張永言也曾經嘗試通過考察個別詞語的消長與更替(如：言一說，他人一傍人，有疾一得病)來探討作品語言的時代特徵，撰有《從

4 王力《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國文月刊》第9期(1941)，又《龍蟲並雕齋文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0)。

5 汪維輝：《試論〈齊民要術〉的語料價值》，《古漢語研究》2004年第4期。

6 蔣紹愚：《蔣紹愚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詞匯史看〈列子〉的撰寫時代》。張永言和汪維輝《關於漢語詞匯史研究的一點思考》(1995)一文討論了八組常用詞在中古時期變遷遞嬗的大概情況，通過具體實例的分析，大力提倡詞匯史研究領域中長期被忽視的常用詞演變的研究。

古白話常用詞的研究論著主要有李宗江《漢語常用詞演變研究》(1999)和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漢語常用詞演變研究》分「專題討論」和「個案研究」兩部分，較為全面地探討了漢語常用詞的演變。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一書探討了三十八組常用同義詞，舉例詳析了這些常用詞從東漢到隋代的演變，其中名詞為目/眼，涕泣/淚(淚)，足/腳，他人/旁(傍)人，翼/翅，舟/船，木/樹，側、畔、旁(傍)/邊，內、中/裡。動詞為衣、冠、服/著(著、箸)、戴，視/看，求、索/尋、覓，寢、寐/臥、眠(瞑)、睡，言、云、曰/說、道，呼(諱)/喚、叫(噉、跽)，使、令/教(交)，擊/打，懸(縣)/掛(掛、絙)，閉/關，覆/蓋，釋/放，書/寫、抄(鈔)、騰(騰)，曝(暴)/晒(曬)，易、更/換，建、築、作、立/起、蓋(戴)、架，還、返(反)、歸/回(迴、廻)，入/進，居、止/住，生/活，宜、當/應、合。形容詞為愚/癡，瘠(瘠)、臞(臞)/瘦(瘦)，痛/疼，誤、謬、訛、舛/錯，寒/冷，疾、速、迅/快(駛)、駛，廣/闊、寬等，大體考定了每一組常用詞的更替從何時發生，到何時完成；描寫了演變更替的過程，對常用詞演變的一般規律有所揭示。⁷就汪維輝論及的這三十八組常用詞而言，舊詞幾乎都是秦漢以前已有的古詞，新詞則大都始見於戰國兩漢。新詞的來源有來自方言的，如「船、著(著)、看、覓、眠、喚、打、疼、冷」等；有來自某詞引申而產生的新義的，如「掛」由「掛住」引申為「懸掛」，「關」由名詞「門門」用為動詞「上門門」，再引申為「關門」等；也有來自其他語言的，如「姐」始見於《漢書》、《說文》，本為蜀羌人呼母，又指姊。

三、古白話詞匯研究的理論探討

隨著古白話詞義考釋的不斷深入，學者們已不再只滿足於僅僅對詞義進行考釋，而是在把詞的內容意義作為重要課題的研究過程中，跳出平面靜觀的審察，開始了詞義本身規律的探討，有意識地把「是什麼」的描寫和「為什麼」的解釋結合起來，在對某一時期或某一專書窮盡性調查、分類和考釋的描寫基礎上進一步考探漢語詞匯演變的規律，在古白話詞匯研究的理論探討上有了新的發展。

1、詞義演變規律的探討

古白話詞匯研究開始深入到語言的內部和外部去尋找引起詞義演變的動力和條件，不僅注意對單個詞意義延伸狀況的描寫，還注意到了相關的詞在意義演變

7 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過程中彼此滲透和伴生的現象。在詞義研究的模式上，已不僅是考釋單個的詞語，而且更是對一組詞或一類詞作整體的觀照與研究。如陸宗達、王寧《訓詁方法論》(1983)探討了詞義引申的因果、時空、動靜、施受、反正、實虛、同狀、同形、同態、同用、同所、同感、禮俗等眾多形式。孫雍長《古漢語的詞義滲透》(1985)提出了「同步引申」的理論，分析了相關詞意義之間的相互滲透現象，指出在傳統的詞義引申的縱向分析之外，詞義引申還有橫向的聯繫。許嘉璐《論同步引申》(1987)又進一步指出詞義引申並不是詞的個體孤立地、彼此隔絕地進行的，一個詞意義延伸的過程常常「擴散」到與之相關的詞身上，引起後者也產生相類似的引申。蔣紹愚《關於漢語詞匯系統及其發展變化的幾點想法》運用義位分析的方法，指出甲詞有a、b兩個義位，乙詞原來只有一個乙a義位，由於乙a與甲a同義(或反義)，逐漸地乙詞也產生出一個和甲b同義的乙b義位的「相應生義」的現象。(1989)朱慶之《試論佛典翻譯對中古漢語詞匯發展的若干影響》(1992)認為研究詞義演變，不僅要揭示變化的過程，還要總結變化的方式。指出所謂詞義沾染是指不同的詞由於處在同一組合關係或聚合關係而發生的詞義上的相互滲透。這種滲透可能導致一方或雙方增加新的義項或詞義的完全改變。張博《組合同化：詞義衍生的一種途徑》(1999)提出了「組合同化」也是詞義衍生的一種途徑，指出組合同化是有方向的，制約同化方向的是組合體中兩要素的語義地位。

2、詞義系統的研究

客觀世界具有體系性，因而反映客觀世界的事物、現象的概念也具有體系性，反映客觀事物、現象和表現概念體系的詞匯同樣也具有體系性。詞匯不是一盤散沙或純屬不相聯繫的語言材料，而是如同語音、語法一樣有其體系性聯繫。詞匯是一個開放性系統，不同的詞在詞匯系統中各有自己的位置，互相聯繫而形成詞義系統。詞義系統中的各個詞義按意義聚合成為若干有序的語義場，按照一定的關係聯結成一個整體，每個詞的意義取決於同一場內其他詞的意義。王力《我的治學經驗》(1985)一文曾指出：「普通語言學還有這樣一個原理：語言的歷史發展也是系統的。從一個時代變到另一個時代，是一個新的系統代替一個舊的系統。」古白話詞匯研究在考釋詞義時已注意到詞義的系統性。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序目》認為研究古代語言要從縱橫兩方面做起。「所謂橫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語言，如元代；其中可以包括一種文學作品的，如元劇；也可以綜合這一時代的各種材料，如元劇之外，可以加上那時的小說、筆記、詔令等。當然後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個時代語言的全貌。所謂縱的方面，就是聯繫起各個時代的語言來看它們的繼承、發展和異同。」徐時儀《古白話詞匯研究論稿》(2000)認為詞義系統可從詞義的微觀結

構、中觀結構和宏觀結構上進行分析。詞義微觀結構系統的範圍是指一個詞的意義範圍和涵義的覆蓋面。詞義的中觀結構是指詞在詞以上的單位中，憑藉意義和形式的各種各樣聯繫線索而組合在一起的詞義類聚。這些詞義類聚比詞大，構成詞匯系統中的子系統。詞義的宏觀結構是建立在中觀結構基礎上的。在語言交際中，反映主觀精神與客觀事物結合的詞義構成了詞義的宏觀結構。王東海《古代法律詞匯語義系統研究——以〈唐律疏議〉為例》(2007)運用結構語義學和認知語言學理論，探討了《唐律疏議》的法律詞匯語義系統，分析了系統中的上下義、平行義關係以及多義詞內部義位之間的語義關係。譚代龍《義靜譯經身體運動概念場詞匯系統及其演變研究》(2008)依據義靜譯經，通過對共時材料的描寫和歷時材料的考察，研究共時系統的產生、形成、面貌、屬性和發展趨勢，探討了「臥睡」等四個非位移運動概念場詞匯系統和「前進」等十四個位移運動概念場詞匯系統的共時面貌和歷時演變情況，指出不同概念場的詞匯系統古今是不一樣的，共時材料中存在著「系統疊加」的現象。

3、詞義理據的探討

作為語言的建築材料，詞匯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同時又處在經常的變化與發展之中。語言的詞匯是不斷發展的，詞匯發展的主要方式是創造新詞，而新詞的創造又是在已有的語言材料和構詞方法的基礎上進行的。人類的詞匯不只是大量隨意記下的表述單位及相關的意義，在人類概念系統和語言系統之中，大部分意義單位既不是徹底任意性的，也不是徹底組合的，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其理據性。理據聯繫使形式單位與意義單位之間、各個詞義之間的聯繫合理化，構成語言詞匯的主幹。因此，新詞的語音形式和意義內容的關係就往往不是偶然的，而是歷史地形成的。正如王力在《新訓詁學》一文中所說：「從歷史上觀察語義的變遷，我們首先應該有明銳的眼光，任何細微的變化都不能忽略過去。」「無論怎樣『俗』的一個字，只要它在社會上佔了勢力，也值得我們追求它的歷史。例如『鬆緊』的『鬆』字和『大腿』的『腿』字《說文》裡沒有，因此，一般以《說文》為根據的訓詁學著作也就不肯收它。我們現在要追究，像這一類在現代漢語裡佔重要地位的字，它是什麼時候產生的。至於『脖子』的『脖』，『膀子』的『膀』，比『鬆』字的時代恐怕更晚，但是我們也應該追究它的來源。總之，我們對於每一個詞義，都應該研究它在何時產生，何時死亡。」⁸古白話詞語由詞組凝固而為複音詞的最多，這

8 王力：《新訓詁學》，《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又《龍蟲並雕齋文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些複音詞的每一個詞素也都有其來歷。古白話詞匯研究在考釋詞義時往往從共時平面對詞語進行歷時演變的研究，注重詞義理據的探討。如江藍生《語詞探源筆記選錄》(1989)探討了「乘涼」、「不待見」、「隱腳」等詞語的語源。郭芹納《釋「感冒」》(1995)指出「冒」有「沖犯」、「遭受」義，「感」亦有「遭受」義。古白話中「感」和「冒」可連用，並可與「風寒」、「暑氣」等詞語搭配。隨著漢語詞匯雙音化的總趨勢，「感」和「冒」漸由同義並列詞組凝固成詞，表示「感了風寒」。後又由動詞變為名詞，用作疾病的名稱。張聯榮《近代漢語詞匯研究中的推源問題》(1995)探討了「正、正復；側、側塞；尋；了達；較、覺、差；能；委；波」等詞的語源，指出對古白話詞匯作斷代研究應注意詞語的推源工作：一要注意詞語的「始現」時間，有些所謂近代漢語的詞語實際上早於唐宋已有出現。二是要注意從聲音入手進行分析，有些詞儘管形式(語音的、文字的)不同，但來源卻是一個。三是要注意詞義的引申關係。

4、詞組詞匯化的探討

漢語詞匯從以單音詞為主過渡到以雙音詞為主，這是漢語內部的一個發展趨勢。學術界在考釋古白話詞義時已意識到雙音詞在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變化比單音詞多且更複雜，往往涉及範疇性質的大的改變，從而引起了漢語詞匯系統的本質性的變化，改變了詞匯系統的整體面貌。解惠全《談實詞的虛化》(1987)和劉堅、曹廣順、吳福祥《論誘發漢語詞匯語法化的若干因素》(1995)曾就漢語詞匯的語法化作有探討。徐時儀《論詞組結構的虛化》(1998)對漢語詞組結構功能的虛化現象進行了探討，指出詞組演變為詞實際上是詞匯語法化的過程。丁喜霞《中古常用並列雙音詞的成詞和演變研究》(2006)探討了中古時期常用並列雙音詞成詞的途徑、演變的機制和規律。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2002)從共時和歷時結合的角度探討了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詳盡的辨析了不同類型短語的詞匯化，指出詞匯化的原因主要是認知和語用方面的因素。董秀芳在結語中認為此書的研究「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從共時與歷時兩個角度同時進行考察對於認清某些語言現象的必要性。以往現代漢語與古代漢語的研究不太搭界，很多從事古漢語研究的人對於現代漢語所關心的問題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太理會；而從事現代漢語的人對於能說明現時存在的某些範疇來源的十分有用的古漢語材料也注意不夠。」⁹有關詞匯化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比較充分地體現了從古白話的角度進行漢語詞匯研究的重要性。語言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中某個詞語的變化常常與

9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頁330。

其他的詞語相關聯。詞匯的發展又具有累積性的特點，共時平面上使用的詞匯就其來源而言含蘊著歷時的積澱。因此，雙音詞替代單音詞不只是簡單、孤立的音節單雙之變，而是一個和語義內容的衰亡、發展、重新分配緊密聯繫的複雜過程。¹⁰徐時儀《漢語白話發展史》(2007)指出就語義而言，由單音詞合成的雙音詞體現了一個由詞組或短語詞義逐漸凝固成詞的變化過程。詞組或短語詞是雙音詞最主要的來源。單音詞組合成的詞組凝固成複音詞，實際上是多義的單音詞抽象虛化或簡化成為單義的雙音詞，即由多義虛化或簡化為單義的詞匯意義演變，同時也可看作是由詞組虛化凝固為詞的一種詞匯語法化現象。漢語雙音詞作為詞匯系統中後起的一類成員，其衍生實際上經歷了一個結構功能虛化的語法化演變過程。很多雙音詞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了一個從非詞的分立的句法層面的單位到凝固的單一的詞匯單位的語法化過程，即由短語詞或詞組演變為詞。

四、結語

繼承和創新是語言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也是古白話詞匯研究在新世紀進一步發展的前提。王士元在《語言的變異及語言的關係》一文中說：「眾所周知，直到現代，中國傳統學問的精髓還是『小學』，而對語言方面的研究正是總稱為『小學』的各門學科的主要內容。」¹¹英國學者羅·亨·羅賓斯說：「按照最狹義的解釋，語言學的中心領域是對語言的形式分析和描寫。只要語言學家擴大其學科範圍而從事意義的研究，就可以說是接近了語文學的研究領域。」¹²俄文版的《語言學大百科詞典》說：「語文學是通過對書面文本語言和風格的分析來研究人的精神文化的諸多學科——語言學、文藝學、文本學、史料學、古文字學等的總合學科……語文學在關注於文本並為文本做輔助性的注釋的同時(這是語文學工作最古老的形式與古典的原型)，從這一視角把人的存在首先是精神存在的全部廣泛深入的內容均納入自己的視野。因此，語文學的內部結構是具有兩極的：一極是不允許脫離文本具體內容的附屬於文本的最低的服務；另一極是界限無法預先劃定的廣大博深性。」¹³辨證唯物論的否定之否定規律體現了事物發展和不斷完善的過程，語言學的發展也是否定之否定的揚棄和完善過程。傳統語言文字的研究由經學的附庸而轉型為以語言為研究對象的現代語言學，現代語言學的發展趨勢也將以新世紀新的

10 參拙著：《玄應眾經音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頁230。

11 王士元：《語言的探索——語言學論文選譯》，(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125。

12 英國羅·亨·羅賓斯：《普通語言學概念》，(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引自鄭述譜：《「語文學」求解》，載《詞匯學理論與應用(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頁46。

13 Волщ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знани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лщя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譯文引自鄭述譜：《「語文學」求解》，載《詞匯學理論與應用(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頁46-47。

當代意識，傳承發明傳統語言文字的研究，關注人的因素和人的作用而有科學的創新，變革為關注人文社會的語言文字研究，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因而我們的古白話詞匯研究的發展趨勢也可以說是由「不允許脫離文本具體內容的附屬於文本的」傳統語文學到「界限無法預先劃定的廣大博深性」新時代語文學的否定之否定過程。

我們正處在大變革的時代，新世紀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迅速地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交流打破了人們封閉的心態和狹窄的視野，而「語言是人類最複雜最廣泛的一種現象，單從一個角度一個學科去看是太狹窄了。要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至少要跟文化歷史、跟人群分佈聯繫起來。」¹⁴20世紀以來的古白話詞匯研究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獲得了新的發展，然而由於古白話的時間跨度長，材料異常豐富，且原有基礎薄弱，所以餘留的空白點還有不少，尤其是古白話介於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區別表現在書面上就是文言與白話的區別，而文白演變是上世紀初語言的重大變動，「五四」時期文白的轉型深刻廣泛地影響了我們整個民族的思維和演說方式，成為中國文化由古典形態走向現代形態的起點。白話文是怎樣取代了文言文？語言的變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起了什麼作用？白話史有哪些發展階段？現代漢語的詞語怎樣由上古演變而來？凡此種種，都與古白話詞匯的研究密切相關，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

漢語文白的轉變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涉及到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價值觀念的更新等諸多方面，而「文白的轉變也是一個新的系統代替一個舊的系統，遵循了語言發展自身的規律」，¹⁵古白話詞匯的演變線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的母語——漢語由文言演變為白話和白話由不登大雅之堂到升堂入室取代文言文的發展過程。因而古白話詞匯研究在漢語詞匯史的研究上意義重大，且有很多的發展空間需要我們進一步開拓，我們需要做的工作是全面整理歸納現有成果，借助於電腦對具體的語料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採用歸納和演繹相結合、相驗證的互動、互證的方法進行古白話詞匯的專書和斷代研究，本著聯繫的、發展的觀點探討漢語詞匯的古今演變和發展，從而不僅使古白話詞匯的研究邁上一個新的臺階，而且也將對普通語言學的研究作出貢獻。

我們期待著21世紀古白話詞匯研究新的更大的發展。

14 石鋒：《訪王士元教授》，《漢語研究在海外》，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年版，頁134。

15 參拙著：《漢語白話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237。